

顧門中的勵耘弟子 ——牟潤孫經史之學的面向及其所反映的師承關係

車行健

政治大學

摘要

牟潤孫，原名傳楷，字潤孫，後以字行。生於北京，祖籍山東省福山縣。一九二九年考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一九三二年畢業。指導老師為陳垣及顧頡剛，復從柯劭忞受經史之學。牟潤孫的學問主要表現在經學與史學兩方面，其經學傳承自柯紹忞，史學則主要師承於柯劭忞與陳垣。柯紹忞和陳垣對其學術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搏塑力量。

牟潤孫生前曾有所謂「南來之學」之說，其南來之學的概念，雖然主要指的是將陳垣的學術傳播至南方，但也包括其終生禮敬，於師承淵源未嘗一日或忘的柯劭忞，所謂「蓼園之學也南來」。惟獨其與顧頡剛的關係頗令人好奇，從現今留存的相關記述中似可看到二人間時有不諧甚或齟齬緊張的狀況，牟潤孫後來甚至疏離顧門而完全投入陳垣勵耘書屋門下。

本文先從分析牟潤孫經、史兼具的學術面向及其學術淵源入手，再進一步深入探討牟氏與陳垣和顧頡剛之間微妙的師門關係與學術關聯。從一開始的學問的不契，再加上個性的不同與做事態度的差異，最終發展至二人師生關係的不諧，因而使牟潤孫陷入「身在顧門，心在勵耘書屋」的尷尬處境，甚至形同「破顧門」、「入陳室」的情況。

關鍵詞：牟潤孫 陳垣 顧頡剛 柯劭忞 南來之學

一 前言

牟潤孫（1908-1988），原名傳楷，字潤孫，後以字行。生於北京，祖籍山東省福山縣。一九二九年考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一九三二年畢業。指導老師為陳垣（1880-1971）及顧頡剛（1893-1980），復從柯劭忞（1850-1933）受經史之學。曾任教於河南大學、輔仁大學、上海同濟大學、上海暨南大學等校。¹一九四九年自上海渡海來臺，一九五〇年經傅斯年（1896-1950）推薦，至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²一九五四年接受錢穆（1895-1990）邀請至香港，擔任新亞書院文史系主任、新亞研究所導師兼圖書館館長，一九五八年轉任歷史系主任，仍兼新亞研究所導師。一九六三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一九六八年應聘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七三年自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退休，轉任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研究員。³主要著作有《注史齋叢稿》上下冊和《海遺叢稿》初編二編共四冊⁴，所述涉及經史闡析、史事考證、政事述論、思想闡發、人物回憶、往事追述、名物商討、小說戲曲之評論等⁵，涵蓋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民國時期罕傳經學論著之整理與研究：以羅倬漢、陳延傑與蘇維嶽三家之著作為中心（III）」（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175）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亞研究所主辦之「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5月7日。

¹ 以上關於牟氏生平簡歷俱參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說明〉，《注史齋叢稿》（增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年6月），上冊，頁1；及李學銘：〈牟潤孫教授編年事略〉，《注史齋叢稿》，下冊，頁786-795。

² 牟潤孫：〈傅孟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感言〉，《海遺叢稿》二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年3月），頁186。案：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1929-2014）》（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2014年11月）所載，牟潤孫係於該年8月始任教於臺大中文系，1953年8月升任教授，1954年離職。在臺大期間他曾開授過古籍導讀、《左傳》及國文領域等課程。（見頁299）

³ 以上俱見李學銘：〈牟潤孫教授編年事略〉，《注史齋叢稿》（增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年6月），下冊，頁789-793。

⁴ 此據牟氏去世後北京中華書局於2009年所出版的版本而言，此版本由其弟子重新編定，與牟氏生前出版的版本在冊數、文章篇數，甚至書名等方面都不太相同（如《海遺叢稿》原作《海遺雜著》）。本文以新編本為據。

⁵ 參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說明〉，《注史稿叢稿》，上冊，頁1。

層面相當廣泛，內容頗為豐富，可謂囊括了牟潤孫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論著。⁶

牟潤孫生前曾有所謂「南來之學」的說法，在〈敬悼先師陳援庵先生〉文中他是這麼說的：

筆者在上海教書時，先師就有「吾道南矣」的話。說句狂妄的話，我願化悲哀為力量，今後將以我有生之年，傳播先師的學說，以期無負於於他老人家的教導。⁷

可見其所謂南來之學的概念是與陳垣的學術有關的，此義，牟氏的弟子遼耀東（1933-2006）有所闡明：

牟先生常說，援庵先生之學北傳，他又將援庵先生之學帶回南方來。……牟先生自一九三三年入燕京大學研究所，直到後來離開北京南下，前後二十年間，追隨援庵先生左右，習得援庵先生的治學方法。……後來他用援庵先生治學的方法，在臺灣、香港教了些學生。牟先生說這些學生有的因而進入史學之門，他們的成就縱有高低的不同，或他們縱然不提治學的淵源出自勵耘書屋，但他們受援庵先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是牟先生說援庵先生之學北傳後，他又將援庵之學帶回南方的原由。⁸

雖然陳垣「吾道南矣」之「南」，當如牟氏另一弟子李學銘所理解的，是概念

⁶ 儘管如此，這兩部文集誠如〈出版說明〉所聲明的，並非牟氏全部著述，其中頗有漏收者，如〈從楊昌浚說到段芝貴——再論監察糾舉制度〉文中提及其有〈從《楊乃武與小白菜》說起〉，刊登於1979年7月29日的香港《新晚報》「風華」版。（《海遺叢稿》初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年3月，頁102。）又如《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8月1日），頁49-55亦刊有牟氏翻譯日人桑原隲藏（1871-1931）著的〈創建清真寺碑〉之譯稿。

⁷ 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庵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88。

⁸ 遼耀東：〈心送千里——憶牟潤孫師〉，收入《海遺叢稿》二編，引文見頁327-328。

較大的南方⁹，但就牟氏的實際狀況來看，他將陳垣學術南傳的地方主要就在臺灣和香港，這顯然跟他的臺、港經歷有直接的關係。但畢竟他待在香港的時間遠遠超過臺灣，所以他的南來之學主要還是傳播在香港一地，而非臺灣。

牟潤孫既以傳播弘揚其師陳垣學術自任，但牟氏的老師不只陳垣一位，尚有柯劭忞和顧頡剛。牟潤孫拜入柯邵忞門下時，柯劭忞年歲已高，親炙時間雖不長，然牟潤孫依然終生禮敬，於師承淵源，更是未嘗一日或忘。¹⁰故李學銘也將牟氏南來之學的概念推擴至於柯劭忞，謂「蓼園之學也『南來』」，提醒人們在談到牟潤孫南來之學的淵源時，固然不可忽略陳垣，但也不可不提柯劭忞。¹¹惟獨與顧頡剛的關係頗令人好奇，從現今留存的相關記述中似可看到二人間時有不諧甚或齟齬緊張的狀況，牟潤孫後來甚至疏離顧門而完全投入陳垣勵耘書屋門下。但這類遠離顧門的情況在顧頡剛弟子中也非罕見，大體說來，顧門弟子疏遠絕離師門有三種情況或類型：一、疏離者，因環境隔絕或性格齟齬等原因，疏於來往或斷絕音訊，但學問仍承襲顧頡剛，甚至繼續傳播顧門學問。顧頡剛在廣州中山大學時期的弟子何定生（1911-1970）即為其代表。¹²二、叛離者，在學問立場上與顧頡剛公開決裂，公然批判，甚至劃清界線，於師門和學問併皆棄離。楊向奎（1910-2000）可謂此類型的代表。¹³三、悖離者，介於上述二者之間，師門雖未棄絕，但學問卻背離。牟潤孫或可屬之。牟潤孫對顧頡剛的悖離不只是性格和為人處世的差異，更是治學方式及風格的扞格，本文擬從牟氏與陳垣、顧頡剛之間的微妙師承關係角度入手，來探討牟氏

⁹ 李學銘：〈牟潤孫先生與「南來」之學〉，《讀史懷人存稿》（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8月），頁299。

¹⁰ 1931年牟氏二十四歲時受業於柯劭忞，柯氏時年八十二歲，兩年後柯氏即辭世。相關敘述見牟潤孫：〈蓼園問學記〉，《海遺叢稿》二編，頁64。

¹¹ 李學銘：〈牟潤孫先生與「南來」之學〉，《讀史懷人存稿》，頁300-301。

¹² 關於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關係請參車行健、徐其寧合撰：〈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53-66；此文又收入拙著：《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9月），頁191-212。何定生與顧頡剛的學術關係請參拙著：〈何定生與古史辨的詩經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頁107-132。

¹³ 關於楊向奎與顧頡剛學問的關係請參拙著：〈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政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14年6月），頁59-96。

與此二人的學術連結，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治學路數與學風的異同。

二 牟潤孫經、史兼具的學術面向及其學術淵源

身為柯劭忞、陳垣與顧頡剛及門弟子的牟潤孫，其主要學術表現也在經學、史學兩方面，他對此是深有自覺的。在香港期間，他曾寄與陳寅恪（1890-1969）一冊他就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講座教授的就職講演《論魏晉以來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後來得到陳寅恪「『烏臺』正學兼而有之」的評語。¹⁴牟潤孫對此評語的理解是：「『烏臺』是御史臺，借以指史學。正學，正統之學，即經學。」為此，他由衷地表達了對陳寅恪「知音難遇」之感。¹⁵能得到陳寅恪如此的評賞，牟氏當確係經學、史學兼擅，甲部、乙部俱通的一位當代學人。

但曾為陳寅恪詩做過箋釋的胡文輝則對此函有不同的理解，他質疑牟氏誤解了陳寅恪的意思，其云：

我覺得陳氏在表面詞義之下，似另有一層影射；作為當事人，牟氏恐怕並未完全理解陳先生的深意。

按：以「烏臺」指史學，以「正學」指經學，未免故作迂曲，陳氏作為史學大家，根本不必玩這種雕蟲小技。而最值得留意的，是原件中的「烏臺」兩字加了引號，「正學」兩字加了專名線（《書信集》省略了專名線），若按牟氏的解釋，就不合標點符號的規範，顯得不倫不類。要知道，如果是「烏臺」表示御史臺，則本應加專名線為宜；如果是「正學」表示正統之學，則又應加引號為宜。現在則正好顛倒，兩不相稱，何也？

我以為，加引號的「烏臺」，疑指蘇軾著名的「烏臺詩案」；蘇軾反

¹⁴ 見陳寅恪：《陳寅恪集》（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9月第2版），《書信集》，頁283。

¹⁵ 以上俱見陳寅恪：《陳寅恪集》之《書信集》，頁284。

對王安石新法，賦詩托諷，被下御史臺問罪，此處可借指文字獄。加專名線的「正學」，則當指明初方孝孺，蜀獻王曾聘方氏為世子師，名其宅屋曰「正學」，故世號正學先生；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對篡位的燕王朱棣（明成祖）抗命不從，被凌遲處死，並株連十族，被難多達八百餘人，此處可借指政治株連。如果這樣，則「烏臺」加引號指事件、「正學」加專名線指人名，就都顯得文從字順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文化大革命」在廣州展開……陳氏此函，正寫於此年十一月間，所謂「烏臺」、「正學」兼而有之云云，若指文字獄和政治株連而言，就完全吻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了。也正因為那樣草木皆兵的形勢，陳氏才會在信中突兀甚至無禮地請牟氏「以後不必再寄書為感」，顯然，那是因為害怕「裡通外國」的罪名啊。

所以，「烏臺」、「正學」當係一語雙關，表面上雖是恭維牟氏的論著，而深層含義則是影射當時的政治恐怖。余英時先生曾將陳氏《再生緣校補後序》稱為「答海外讀者的一通密電」（《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則陳氏此函，亦可謂「答海外友人的一通密電」也。¹⁶

然而不論牟氏對陳寅恪回函的反應是否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但由牟氏自詡的心情來看，無疑也承認經、史之學兼擅是其治學特色。

牟潤孫經、史之學的形成與陶塑除了其師門傳授外，尚其他的學術淵源，包括啟蒙、私淑及欽敬友善之師友的影響等，此皆由其著作自述可見者，以下依次論敘。首先就其學問啟蒙而言，梁啟超（1873-1929）在牟氏青少年時代給予他極大的影響，甚至引導他走向史學之路。¹⁷他先是跟隨父親看《東方雜誌》、看報紙才逐漸崇拜梁啟超。¹⁸到了十五歲那年，他在《晨報》看到了梁氏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覺得耳目一新，眼界為之開闊。後來

¹⁶ 胡文輝：〈陳寅恪致牟潤孫函中的隱語〉，《人物百一錄》（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頁226-229。

¹⁷ 牟潤孫：〈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從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說起〉，《海遺叢稿》初編，頁225。

¹⁸ 牟潤孫：〈買書漫談〉，《海遺叢稿》二編，頁289。

又買了梁氏的《清代學術概論》，讀後非常崇信。十六歲以後就按日求書，梁啟超在《東方雜誌》發表的〈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總成績〉成了指導他的索引，他專門看梁氏提及的那些書。在大學休學期間，甚至照著梁啟超的路子，寫了一些東西，並以此做為報考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論文著述審查資料。面試他的陳垣對其頗為賞識，把他招收了進來。¹⁹從梁啟超那裡，讓他獲益最大的應是學習到研究學問要如顧炎武（1613-1682）探求古韻般地找尋證據，運用歸納方法，歸納許多證據方可找出結論。又因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首先推崇顧炎武，從此顧氏在其心中留下極崇高而深刻的印象。²⁰由顧炎武而延伸至清代學術，後來也成為牟氏治學的一個主要領域，新編本《注史齋叢稿》中甚至將其清代學術相關論著專門獨立成一個類目。欲探其肇始發端之跡，則固不能不承認此係梁啟超啟迪之功。他直到晚年回首前塵往事，仍然語帶感激的說：「引我進入學術之門者，總不能說不是任公先生。」²¹

梁啟超之外，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也不小，他曾公開為文承認自己私淑其學。²²但牟氏對陳寅恪的接受也歷經了一段曲折的歷程。他一開始時並不太能讀陳寅恪的文章，因為陳氏的文章，或論蒙古源流，或論西夏譯經，或論梵藏譯經，均讓他感到枯燥無味，殊難接受。後來還是受到陳垣的啟發，對他指出陳寅恪文章的優點及學問的淵博、通曉語言的眾多，才讓他茅塞頓開，從此對陳寅恪崇拜萬分，以私淑弟子自居。²³在他心目中，陳寅恪的地位是無比崇高巨大的，除了他的受業恩師柯劭忞和陳援庵之外，就當推陳寅恪了。他嘗自謂：

陳寅老發表什麼東西，我全都細念。甚至，陳寅老給清華大學出對子後，寫的那封給劉文典的信，我都能背下來。寅老審查馮友蘭《中國哲

¹⁹ 以上俱見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5-296；〈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從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說起〉，《海遺叢稿》初編，頁226。

²⁰ 牟潤孫：〈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從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說起〉，《海遺叢稿》初編，頁226。

²¹ 牟潤孫：〈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從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說起〉，《海遺叢稿》初編，頁229。

²² 牟潤孫：〈敬悼陳寅恪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124。

²³ 牟潤孫：〈發展學術與延攬人才——陳援庵先生的學人丰度〉，《海遺叢稿》二編，頁120-121。

學史》報告，我也念得很熟。的確，我對寅老十分崇拜。²⁴

他對陳寅恪學術的崇拜表現在治中古學術與政治的領域上，遼耀東也注意到了牟氏〈論魏晉以來之崇尚談辯及其影響〉、〈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與〈從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論中國文人政治之形成〉這一系列作品，皆是陳寅恪所謂「不古不今」之學的魏晉隋唐之史的範疇。不僅寫作的形式與方法，十分類似陳寅恪，且其中某些論點也是對陳說的擴充補正。²⁵

啟蒙、私淑之外，牟氏又有其欽敬友善的師友，對其學問皆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如經史兼擅，精通古書體例及錄略之學的余嘉錫（1884-1955）、啟發其文化人類學知識的李宗侗（玄伯，1895-1974）、精研中西交通史的向達（1900-1966）和方豪（1910-1980）等。他跟余嘉錫同為柯劭忞門下，所不同者，余嘉錫是柯劭忞光緒二十七年（1901）典試湖南所取的得意門生，而牟潤孫則直至1931年才受業於柯劭忞。另外一方面，他又與余嘉錫的哲嗣余遜（1905-1974）同列陳垣勵耘書屋門牆，又同為輔仁大學同事，他視其為畏友，事之如兄。他說在晉謁余嘉錫之前，已間接得聞教誨，其後摳衣登堂，親受啟示。雖非「讀已見書齋」弟子，但實際上無異於立雪執贄。²⁶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目錄學發微》、《世說新語箋疏》、《余嘉錫論學雜著》等書都是他在平日談論中常常提及的。²⁷但他對余嘉錫的欽敬卻非僅止於純粹學術的一面，他嘗感歎世人徒知余嘉錫是經史考據大家，但卻很少人知道他深於義理之學，真正是朱子的信徒。他以為一個真正儒家學人，必須兼「尊德性」與「道問學」而

²⁴ 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9。

²⁵ 遼耀東：〈心送千里——憶牟潤孫師〉，收入《海遺叢稿》二編，332-333。遼耀東舉牟氏在〈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文中評論陳寅恪所謂唐代統治階層為關隴胡漢集團之說實較偏重統治實權一事，而忽略了文化上仍有南北歧見，而此又關乎延攬人才以佐政之事。牟氏以此致憾於陳寅恪對隋唐制度淵源僅論及南朝前半期之文化制度，而未語及於思想學術，思欲有所補充修正。此外，牟氏〈從唐代初期的政治制度論中國文人政治之形成〉一文也是在陳寅恪未論及唐代文人政治的形成之情況下，而為文進一步申述此問題。

²⁶ 牟潤孫：〈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219。

²⁷ 李學銘：〈烏臺正學兼有的牟潤孫教授〉，《海遺叢稿》二編，頁310。

一之，而他認為余嘉錫真正做到了這一點。²⁸

牟氏接觸李宗侗的學問亦是透過陳垣。據其自述，李宗侗在故宮盜寶案發後，蟄居上海租界，翻譯法國文化人類學談古代希臘祭祀祖先禮俗的書（謹案：當為古朗士〔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的《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陳垣讀後傾倒備至，廣為宣揚，教其讀此書。牟氏到臺大後，常向李宗侗請教母系社會問題²⁹，而這也表現在他用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所寫的相關論著，如〈春秋時代母系遺俗《公羊》證義〉、〈宋人內婚〉、〈漢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試釋〉、〈呂雉奪權與母系遺俗〉等文。³⁰

向達可說是牟潤孫在大陸時期極為親密的摯友，二人因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而結緣，當時他們時常為「圖書副刊」寫稿，署名「海遺」。牟氏後來定居香港，為《新晚報》寫稿時，為紀念他和向達的交誼而仍沿用此筆名。³¹向達專攻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後者雖非牟氏所精擅之領域，然亦有〈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證〉一文，其中頗有與向達商榷是非者。³²中西文通史則是牟氏早年治學的方向，而這也讓他與向達有了共同的愛好，他欲撰《徐光啟年譜》，向達就將他所知道的材料告訴了他。³³除了向達之外，身為陳垣函授弟子的方豪也在中西交通史方面與牟氏有共同的語言。牟潤孫與方豪誼屬同門，對其學問知之甚深，會悟者亦多。在他看來，方豪最專精的當屬明清之際，基督教傳入中國後，中西文化交流的那一段歷史，這涉及明清史、宗教史與中西交流史的範圍，這在相當大的程度與陳垣的治學領域相重疊，事實上，出身於杭州天主教修道院的方豪，當年正是透過私下與陳垣通信的因緣，才走上治中國史學的路。故陳垣的著作，方豪無一不取而讀之，而所治之學與治學

²⁸ 牟潤孫：〈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229。

²⁹ 牟潤孫：〈發展學術與延攬人才——陳援庵先生的學人丰度〉，《海遺叢稿》二編，頁121；又參〈漢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試釋〉，《注史齋叢稿》，上冊，頁247。相關討論又參遼耀東：〈心送千里——憶牟潤孫師〉，收入《海遺叢稿》二編，頁331。

³⁰ 此四文均收入《注史齋叢稿》，上冊，頁350-366。

³¹ 以上俱參牟潤孫：〈悼念向達〉，《海遺叢稿》二編，頁194。

³² 此文收入《注史齋叢稿》，上冊。

³³ 牟潤孫：〈悼念向達〉，《海遺叢稿》二編，頁195；〈發展學術與延攬人才〉，《海遺叢稿》二編，頁119。

法門亦悉出自陳垣的啟迪。³⁴但牟氏後來還是沒能完全走向中西交通史這條路，他自歎《徐光啟年譜》始終未完成，且也因資料難取得的原因放棄了研究中西交通史。但即使如此，他與方豪共同受業於勵耘書屋的因緣及與向達真摯的友誼也確實在他的學術發展歷程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跡。³⁵此所以在其文集中仍留存了中西交流史，以及宗教史與明清之際史的相關論著。

除此之外，據李學銘教授回憶，還有一些當代學人也是牟潤孫所佩服的，如錢鍾書（1910-1998）、吳晗（1909-1969）和朱東潤（1896-1988）等。錢氏的《談藝錄》、《宋詩選注》、《七綴集》、《管錐篇》；吳晗的《朱元璋傳》、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等書，都是牟氏認為有考證、有文筆，能深入淺出的史學佳作。³⁶對牟氏的學問，當亦能有一定程度的啟迪。

三 牟潤孫與顧頡剛、陳援庵的師門關係與學術連結

牟潤孫既自負於經學、史學兼具，其經學傳承自柯紹忞，史學則師承於陳垣，柯劭忞、陳垣固為其授業師，二人對其學術可說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搏塑力量。然而其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另一導師顧頡剛，於其學術影響又如何呢？

如果說何定生為顧頡剛門下大弟子，為顧頡剛在廣州中山大學時期所親炙的學生，跟隨他休學一路北返北平。牟潤孫則是顧頡剛回到北平後所開始收的正式學生，且為級別較高的研究生，於顧門中自有其地位。但牟潤孫進入顧頡剛的門下卻不是他主動選擇投入的，而是考入燕大國學研究所後，由所裡分派給顧頡剛的。據他自己的回憶，當時顧頡剛雖很賞識他，但他對顧頡剛的《古

³⁴ 以上俱參牟潤孫：〈跋《方豪六十自定稿》〉，《海遺叢稿》初編，頁287；〈方杰人司鐸六十壽序〉，《海遺叢稿》二編，頁230；〈悼亡友方杰人——陳援庵先生與方豪〉，《海遺叢稿》二編，頁211。

³⁵ 牟潤孫：〈跋《方豪六十自定稿》〉，《海遺叢稿》初編，頁288；又參〈崇禎帝之撤像及其信仰〉，《注史齋叢稿》，下冊，頁717。

³⁶ 李學銘：〈烏臺正學兼有的牟潤孫教授〉，《海遺叢稿》二編，頁310。

史辨》卻並不十分贊同，反而喜歡陳垣的治學方法。³⁷學問的不契似乎也影響了師生二人的相處，再加上個性的不同與做事態度的差異，最終發展至二人師生關係的不諧，因而使牟潤孫陷入「身在顧門，心在勵耘書屋」的尷尬處境。

牟潤孫在顧頡剛門下與其相處的狀況，在顧頡剛日記和書信中仍可略見其梗概。牟潤孫最先出現在顧頡剛的日記中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星期一，顧頡剛當時記的就是「我的學生：……國學研究所學生：班書閣、牟傳楷。」³⁸在十月十六日的日記中他又記道：「班書閣偕牟傳楷來，此二人皆派與予之研究生也。」³⁹又據他同月二十三日所記，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共招收五位研究生，牟潤孫和班書閣是歸他指導的史學領域的兩名學生。⁴⁰從此之後顧頡剛與牟潤孫師徒二人來往日趨密切，時有一日兩見的情形。⁴¹顧頡剛所寫的日記完整地呈現了二人相處的實況，包含實際的接觸，如晤面、談話、吃飯等；以及非實際的接觸，如通信記錄、日記中對其相關活動之間接記載和載錄他人轉述牟氏話語等。從一九二九年十月直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共有一四四天的日記提到牟潤孫，其中一九三〇年的五十五天為最多，平均每個月有4.5天會與他有所接觸。一九三一年的二十六天次之，一九三二年的十七天又次之。直到一九三四年後才有明顯的減少，一九三六年甚至只有兩天。⁴²且從一九三二年後，

³⁷ 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6-297。

³⁸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5月），第2卷，頁330。案：牟潤孫在〈敬悼顧頡剛先生——兼談顧先生的疑古辨偽與提携後進〉一文中聲稱他是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收的第一個研究生。（見《海遺叢稿》二編，頁217。）然而當時分給顧頡剛指導的研究生還有班書閣，且據《顧頡剛日記》所記，排名似還在牟潤孫前面，則此「第一」似乎還不易遽下判斷。

³⁹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頁333。

⁴⁰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頁336。

⁴¹ 如1929年11月5、12日；12月4日；1930年3月22日；4月18日；5月28日等。

⁴² 顧頡剛在日記中所記載的具體日期如下：1929年10月7、16、23、27日；11月2、4、5、12、27日；12月4、9、11、18、23、26日。1930年1月13日；2月2、17、18、28日；3月1、10、12、14、21、22、25日；4月3、18、25、27、29日；5月6、9、12、22、28日；6月4、15、18、21、24、28、29日；7月5、17、21、28日；8月8、12、19、28日；9月1、5、13、16、22、25、29日；10月8、9、14、16、29日；11月19、28日；12月3、11、15、31日。1931年1月21日；2月6、11、16、24日；3月6、18日；4月1日；6月2、4、8、24日；7月6日；8月24日；9月4、16、25、28日；10月19日；11月1、9、17、23日；12月6、10、12日。1932年1月11、17日；2月13日；3月18日；4月27日；5月10日；6月13、14、18、21日；7月2、4、7日；

顧頡剛與牟潤孫的來往漸漸由實際的接觸轉變為非實際的接觸，這明顯反映在顧頡剛在日記中記錄他寫信給牟潤孫的次數上。牟潤孫一九三二年從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後有四年的時間在中學教書⁴³，因此也就自然地從顧頡剛的視界中淡出，《顧頡剛日記》對二人關係的記載也就正好反映了這樣一個由往來熱絡密切到逐漸疏遠的過程。

但此時顧頡剛與牟潤孫的師徒關係卻絕非僅是牟潤孫離校教書而自然的疏離冷淡這麼單純，橫互在二人之間的似乎是更多的緊張矛盾，如顧頡剛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道：

煨蓮（謹案：即洪業〔1893-1980〕）告我，牟潤孫在城內大罵我，謂我「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⁴⁴

更嚴重者，在隔年的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顧頡剛又記道：「寫牟潤孫信，申誠之。」⁴⁵為何事申誠牟潤孫？日記未言，但此信連同牟潤孫的答書卻一併收錄在《顧頡剛全集》中的《書信集》，原信是如此寫的：

數度枉過，歉仄奚似。兩函均讀到，敬悉。此間局面過小，添員綦難。今欲為兄告者，只要兄努力以成其學，弟總有法子解決兄之困難。弟年來頗對兄不滿，所以然者，以兄天稟之高，根底之善，而因循玩忽，六年來未有一事成功。在研究所時，集蕃姓材料頗多，弟累勸成書，曾未許見。其後編《歐陽修辨偽書語》，請作一序，亦至今未成。稍後，弟

8月16日；9月1日；11月12日；12月31日。1933年1月3日；2月5、10日；3月31日；4月2、7、11、15、16、26日；5月21日；6月28日；7月7日。1934年2月11日；3月10、18日；4月3、26日；7月3日。1935年2月23日；5月6日；7月9、16、17、23、25、26日；8月9、13日。1936年4月22日；8月24日。

⁴³ 李學銘：〈牟潤孫教授編年事略〉，《注史齋叢稿》，下冊，頁788。

⁴⁴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3卷，頁182。

⁴⁵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3卷，頁367。

編《禹貢》，地理沿革史者，兄有志專研之學也，初計宜有文來，而迄今兩載，曾無隻字投下。禹貢學會初辦時，即承填入會書，而至今會費分文未繳。精神如此散漫，安能作事！弟愛兄之才至矣，而兄之使我失望乃如此，兄亦知弟心痛否耶？為今之計，亟宜挺起脊梁，力自振作，每日必讀若干書，必寫若干字，有精神固做，無精神亦做，勿肆意於酬應，勿費時於閒談，如此數月，當能使兄之研究工作上軌道，夫然後弟有勞兄作事之可能。弟本性喜苦幹，喜獨闢道路，喜認清了路徑，不厭不倦的向前走，因之我亦希望人家如此，因之凡不能如此者，弟不願輕認為同志也。率直布臆，諸希鑒諒。如兄接此函後，對弟說表同情，則請從今日起，每日記日記，記筆記，每一星期送弟處覽之。如覺得如此嚴正生活不堪其苦，則弟亦不敢相強，但望兄知弟非優閒生活中之人物而已。⁴⁶

從顧頡剛的信中可知，牟潤孫當是託顧頡剛謀職求事，但所謀何事，信中未明言，日記也未詳記。考顧頡剛於該年三月獲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聘為該院歷史組主任，七月一日正式上任，聘了不少故舊與門生，或任會員，或司編輯，或做助理，但牟潤孫不與焉。⁴⁷牟潤孫兩度致函顧頡剛謀事者，或即北平研究

⁴⁶ 顧頡剛：〈致牟潤孫〉，《顧頡剛全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12月），第41冊，《顧頡剛書信集》卷3，頁42-43。

⁴⁷ 參顧潮：《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260-262。案：顧頡剛在1935年3月29日接獲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長李書華（1889-1976）邀請的電訊後，即在日記中記下他個人的感想：「因為個人研究計，燕大環境已極好，惟為提拔人才計，則殊不足以發展。如北平研究院能給我三千元一月，方有提倡文化之具體辦法。」（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3卷，頁324。）在同年5月5日的日記中，他列出了所欲提拔的人才名單：「預備介紹至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之人：馮家昇——〈四裔傳〉、《遼史》；孫海波——《史記》；鄧嗣禹——〈職官志〉；連士升——〈食貨志〉；吳世昌——北平半月刊、藝術陳列所；陳懋恆——《史記》；楊向奎——《史記》；王育伊；邵君樸——《儀禮》；楊效曾——〈食貨志〉；李子魁；李素英——北平半月刊。」（同上，頁339-340）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後來最終聘了吳豐培、張江裁、吳世昌、劉厚滋等任編輯，常惠、許道齡、劉師儀、石兆原等任助理，孫海波、徐文珊、馮家昇、白壽彝、王守真、鄭平章、楊向奎、顧廷龍、王振鐸、童書業、楊效曾、王育伊等任名譽編輯，洪業、許地山、張星烺、陶希聖、聞宥、孟森、吳燕昭、錢穆、呂思勉、聶崇岐任史學研究會會員。（顧潮：《顧頡剛年譜》，頁262。）在這些名單中均不見牟潤孫之名。由此可知，自始至終，牟潤孫皆非顧頡剛屬意的人才。

院歷史組之職務。

牟潤孫接到如此嚴厲的申斥信，隨即在隔日寫了一封致歉的信函，承認自己「因循怠荒，一無成就」，如顧頡剛訓斥者，雖自知其非，卻沉溺不自拔，在顧頡剛當頭棒喝下，頗思立定腳根努力向上。因此決定自即日起，自定日程，埋首讀書，杜絕酬應，並照指示每日作日記、記筆記，每週送呈顧頡剛批閱。他反省自己的毛病在於怠荒、無恆與精神不集中，他認為得到其師的策勉，當能滌除舊習而走上自新之途。⁴⁸

在顧門中得到顧頡剛如此愛之深責之切待遇的，牟潤孫顯然不是惟一的一個，他的同門「大師兄」何定生在隨顧頡剛北返後，也因與顧頡剛在生活上的摩擦，再加上個人情感的挫折，荒廢了學業，而遭致顧頡剛的責備，最後疏離了顧頡剛的門庭。⁴⁹但與何定生不同的是，牟潤孫與顧頡剛的齟齬並非只是單純性格或生活作風上的問題，而有著更複雜的學問取捨與師承選擇的問題。

在治學的問題上，牟潤孫始終就與顧頡剛所專擅的疑古辨偽不契，他之入顧頡剛門下，也並非他主觀的意願。這使得他在接受顧頡剛指導的過程中，一直顯得格格不入。顧頡剛在書信中指責他在為《歐陽修辨偽書語》作序一事上，態度消極散漫，從牟潤孫的角度來看，則顯然並非如顧頡剛所認知的。他晚年提及此事是這麼說的：

頡剛先生要我編一本《歐陽修辨偽集語》，我鈔錄完了之後，始終沒交卷。頡剛先生問我為什麼？我回答說：「我興趣改變了。」⁵⁰

其實牟潤孫從一開始就對辨偽之學不感興趣，梁啟超雖是啟蒙他的人，但他卻對梁啟超所說的辨偽及某些今文說法不感興趣。⁵¹由此看來，他對顧頡剛所說

⁴⁸ 牟潤孫：〈答顧頡剛書〉，《顧頡剛全集》，第41冊，《顧頡剛書信集》卷3，頁43。

⁴⁹ 參車行健、徐其寧合撰：〈顧頡剛與何定生的師生情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又收入拙著：《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

⁵⁰ 牟潤孫：〈敬悼顧頡剛先生——兼談顧先生的疑古辨偽與提携後進〉，《海遺叢稿》二編，頁216。類似的敘述又見於氏撰：〈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7。

⁵¹ 牟潤孫：〈論治目錄之學與書籍供應——從梁任公《國學入門書要目》說起〉，《海遺叢稿》初編，頁227。

的「興趣改變了」，顯是託詞。真正的原因應是他此時已為陳垣的治學方法所吸引，他的學術方向與興趣說完全轉向了勵耘學風。所以他對顧頡剛的指導表現出抗拒的心態，甚至連顧頡剛開的《尚書研究》也在聽了兩次後，就不去上課了。⁵²

牟潤孫在憶及顧頡剛指導他進行研究工作時是這樣說的：

頡剛先生給我出了一個沒法兒作的題目《清代禁書考》。我去那兒找這些禁書呢？很難，我沒法作，我也不習慣他的這種指導方法。他對於後學，經常是「你這篇文章好，我給你發表」。而陳垣老不同，陳垣教學生是：「你不要胡寫啊，小時候亂作，老了要後悔的。不能亂寫文章啊！」兩個老師完全不一樣。顧先生給我定這題目，陳垣老是所長，也對我說這材料很難辦，我領你到故宮看，故宮有人搞，……他們那兒有材料，但他們不肯給你，你去那兒看看得了。當然人家是不肯給我了，我也就沒有作。後來陳垣老說：「我給你出個題目。」就是研究入居中國的外國人的蕃姓。……讓我搜集這些，作《蕃姓考》，結果我的論文是陳垣老指導的。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挺荒唐的，因為人家有制度，有導師，怎麼能撇開導師而直接由所長指導呢？⁵³

語氣間對陳垣與顧頡剛的抑揚極其明顯，雖然說自己荒唐（連帶拒編《歐陽修辨偽書語》一事也說自己荒唐），但從其口氣來看，還是不免有自鳴得意的味道。而他一連用了兩次「沒法作」來表達顧頡剛給他出的《清代禁書考》題目不合理，並藉著陳垣的權威及到故宮觀書一事，來支持這個論點，更是對顧頡剛不留情面的嘲諷。但顧頡剛讓牟潤孫做這個題目絕非天馬行空，毫無理由的神來一筆式的指導，而是與顧頡剛自己的治學歷程息息相關的。因為早在一九一六年，顧頡剛便藉著休學養病的空閒，利用家中的藏書，歷半年時間，寫成

⁵² 牟潤孫：〈敬悼顧頡剛先生——兼談顧先生的疑古辨偽與提携後進〉，《海遺叢稿》二編，頁214-215。

⁵³ 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6-297。

《清代著述考》二十冊，編列五百餘人。通過這項工作，使其對清代學術有了深入的領會。⁵⁴因此從顧頡剛的角度來看，他不會認為這個題目不能作。相反地，牟潤孫因為畏於資料蒐集之困難而放棄研究的，尚不只此例，《徐光啟年譜》的未能完成，亦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甚至因此中斷了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如此一來，豈不反而更加印證了顧頡剛對其「因循玩忽」批判的鞭辟入裡。

畢業論文改由陳垣指導，對於顧頡剛來說，縱非破出師門，但想必仍是極大的難堪。其實牟潤孫「出顧門」、「入陳室」的舉動也具體而微地反映了當時顧頡剛與陳垣的緊張關係。《顧頡剛日記》保留了陳、顧不合的一些蛛絲馬跡，如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記道：

今日以《燕京學報》稿費單請援庵先生簽字，他正在挑剔（這是老例，非此不足以表示其所長之地位），希白（謹案：即容庚〔1894-1983〕）在旁插口道，「你看文章太寬，什麼人的文章都是好的」（這也是他的老話，今日又說一遍而已）。我被兩種氣夾攻，一時憤甚，即道，「我不編了！」因此之故，終日頭痛，夜且失眠。予之為人，在討論學問上極能容忍，而在辦事上竟不能容忍如此。《學報》事到年底必辭，記此勿忘。⁵⁵

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更記道：

陳援庵先生近年太受人捧，日益驕傲，且遇事包而不辦，又不容人辦，故燕大研究所雖有巨款而無成績，且無計畫，其訛訛之聲音顏色，直拒人於千里之外。此間有吳雷川作校長，有陳援庵作所長，自應成官僚化矣，予現在編《燕京學報》，不能不與之接觸，每見輒感不快，決定明

⁵⁴ 顧潮：〈前言〉，《顧頡剛全集》，第56冊，《清代著述考》卷1，頁1。

⁵⁵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頁444。

年擺脫矣。⁵⁶

這中間固然有人事相處的矛盾，更有雙方對待學術態度的差異。就後者而言，其實就反映了嚴謹與寬容的兩種學風。陳垣告誡牟潤孫文章不要妄作，對顧頡剛所編的《燕京學報》諸多挑剔，這種態度與傅斯年如出一轍。當年顧頡剛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民俗學會叢書》，出到一二冊時，傅斯年就說「這本無聊」，「那本淺薄」。傅斯年對學術出版抱持的態度是「大學出書應當是積年研究的結果」。蓋其在歐洲待了七年，甚欲步法國漢學後塵，與之爭勝，故旨在提高學術水平。但顧頡剛則以為欲與人爭勝，必先培育一批人，積疊材料加以整理，所以較從「誘掖引導」的角度，來提倡學術。⁵⁷

顧頡剛與牟潤孫的師生關係導入了「陳垣因素」後，無異雪上加霜。顧頡剛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寫給牟潤孫的那封嚴厲的申誠信應該就是這種複雜的關係所累積的負面能量的總爆發。而寫這封信的前一天，顧頡剛除在赴北平研究院途中遇到牟潤孫外，還耳聞了一件令他不開心的事：

肖甫（謹案：即趙貞信〔1902-1989〕）告我，援庵先生以其接近我，而我今任院事，疑必邀之，遂解其女中職務。又聞季龍（謹案：即譚其驤〔1911-1992〕）言，亦大致如是，輔仁功課已不能繼續。氣量之小如此，如何成事。此豈非「為淵驅魚」耶！⁵⁸

或許這件事就是觸發他對牟潤孫不滿情緒的導火線也未可知。

從較嚴格的學術標準來看，如陳垣、傅斯年所持者，則不只顧頡剛所力主提倡普及的學術態度為輕率，就是顧頡剛本人所優而為之的疑古辨偽學風也不夠嚴謹。此所以服膺勵耘學術的牟潤孫終身持續不斷地批評顧頡剛所代表的疑

⁵⁶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頁461。

⁵⁷ 以上俱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頁124-125、128。

⁵⁸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3卷，頁367。

古辨偽學風。如其在〈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一文中評述余嘉錫深明古書體例，甚不以五四之後盛行的辨偽風氣為然，並引其《四庫提要辨證》對〈管子提要〉的評論，指出余氏在藉由抨擊《四庫提要》「往往以後世之見議論古人」的同時，其實是為當時瀰漫辨偽風氣下受過疑古學說薰陶的人，所說的一番補偏救弊的言論。其下又提及余氏在為〈六經奧論提要〉所作的辨證中指出顧頡剛撰《鄭樵著述考》疑《六經奧論》非鄭樵所著，譏諷其未讀全祖望（1705-1755）的集子。牟潤孫對余氏的評論語帶悻然地做了如此的小結：「對頡剛先生這篇未成熟之作，季老僅說『或者未考全氏集歟』，已是很客氣了。」⁵⁹

又如他在評述陳寅恪〈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一文裡對清代經學流弊所說的「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這段話，做了一番演繹：

五四以後疑古史的人沿著清末今文派經學家的妄說，好作奇詭之論，寅恪先生此文確是針對著一般荒唐學人說的。⁶⁰

豈其師顧頡剛亦其所謂「荒唐學人」歟？

牟潤孫不但不喜疑古辨偽學風，甚至覺得這種治學方式是根本的謬誤，他在一九七二年時寫〈讀《陳寅恪先生論集》〉時嘗用充滿無比信心的口吻說道：

時代到了今日，疑古風氣雖不及五四之盛，而說到《左傳》還有人以為析自《國語》；對於《周禮》，還有人以為是出于劉歆之手。我指出寅恪先生對古書的看法，不僅要說明他的治學態度和遠見，更因為今日地下材料出土眾多，古書之不當亂疑，已成為治史學應有的常識，而執迷不

⁵⁹ 以上俱見牟潤孫：〈學兼漢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220-221。

⁶⁰ 以上俱見牟潤孫：〈讀《陳寅恪先生論集》〉，《海遺叢稿》二編，頁139-140。

悟的疑古之徒居然尚大有人在，不能不引為遺憾。⁶¹

論調一何似現今中國大陸學界所高倡的「走出疑古時代」！但他所指斥的「執迷不悟的疑古之徒」可能已不包括顧頤剛了。因為他所理解的晚年顧頤剛已從早期對古史古書無所不懷疑的態度中慢慢淡消下來。⁶²

古書既不當亂疑，之前為學界所判定的偽書似也不能一概而論，他對所謂偽《古文尚書》也有別於以往的積極態度，其云：

我覺得對偽書不能一概而論，比如閻若璩費了老大力氣，辨偽《古文尚書》，差不多也可以成為定案吧！但是，能說偽《古文尚書》完全是王肅虛造嗎？其中有真材料，它是東晉不曉得什麼人，對所見《古文尚書》的材料，不懂得採用像宋人那種輯佚書的辦法，一條一條輯，不連綴也不要緊。但他不，他想把它連起來，恐怕其中還有翻譯，於是「藝術加工」成為一個整篇的文章，所以別人認為這是假的。實際上《古文尚書》，現在有許多人發現其中有真的。所以，我覺得像歐陽修那樣的「辨偽」做得有些過分。⁶³

又云：

筆者一直相信《尚書》古文部分，是東晉時，孔安國得到殘缺不完整的古文《尚書》，將它匯輯在一起。為了連綴成文，字句間可能有所添改，以致改變了本來面目，使人生疑（孔安國為東晉人，由他編成古文《尚書》，是陳夢家首先考證出來的）。其中有真史料是毫無疑問，如說它全部出于偽托，恐有些過分。⁶⁴

⁶¹ 牟潤孫：〈讀《陳寅恪先生論集》〉，《海遺叢稿》二編，頁143。

⁶² 牟潤孫：〈敬悼顧頤剛先生——兼談顧先生的疑古辨偽與提携後進〉，《海遺叢稿》二編，頁216。

⁶³ 牟潤孫：〈談談我的治學經歷〉，《海遺叢稿》二編，頁297。

⁶⁴ 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庵先生〉，《海遺叢稿》二編，頁83。

其實從辨偽學的角度來看，偽書本來就有程度的不同，不論是全部偽或部分偽，都可稱為偽書，因此也就需要進行辨偽工作。更何況還有後人連綴成文，藝術加工的地方，若不加以考辨，冒然接受，豈非囫圇吞棗，全盤信以為真？而漢人基於利祿的動機，本就有炮製偽書，以獵取利益的事例。牟氏方之輯佚，亦恐未盡然也。

四 結論

牟潤孫與其師顧頡剛在對待疑古辨偽的態度上有極大的差異，自始至終，牟潤孫從來沒有接受顧頡剛所倡導的疑古辨偽的學風，從這個角度來說，牟潤孫並非顧頡剛真正的學生，而只是名義上由他所指導的學生。因而也可以說，他從未真正進入「顧門」中，實非顧門弟子。但無論如何，名義還是存在的，而其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中也實實在在地接受過顧頡剛的實際指導，《顧頡剛日記》所留存的紀錄已足可說明一切。無論如何，這份師生情誼還是存在的，此所以牟潤孫終其一生仍以師禮對待顧頡剛。

但牟潤孫卻對顧頡剛辨偽疑古學風有所悖離，他們之間的學術關聯與交集，可說幾乎不存在，只存在不相契合的學術連結，而此就是其對顧頡剛疑古辨偽學風的批判。然而誠如顧頡剛另一位著名的弟子劉起鈞（1917-2012）所認為的，顧頡剛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對歷史資料進行批判地審查的工作」，這個工作又正是現代史學必不可少的基礎。⁶⁵因而即使如此反對疑古辨偽學風的牟潤孫，在從事相關學術研究工作時，也時有乞靈此術的時候。如他雖承認《春秋命曆序》所記載的帝王或氏族名號都是真實的，但對各帝王的世系年數以及次序傳承，他認為就現存的紙上材料，結合已出土的地下材料，仍尚不容易整理明白，作出清楚準確的斷定。⁶⁶此豈非「對歷史資料進行批判地審查的工作」？又如其以為《漢書》〈高帝紀贊〉敘其先世由來諸語係出自附會，毫無足採。蓋班固所據者雖為《左傳》，《左傳》固非劉歆析自《國語》，然而文

⁶⁵ 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市：中華書局，1986年5月），頁155、276。

⁶⁶ 牟潤孫：〈中國早期文字與古史研究〉，《注史齋叢稿》，上冊，頁234。

公十三年《傳》「其處者為劉氏」一語，無論是否為後人所加，然士會至高祖之世系孰能詳之？⁶⁷此亦豈非疑古辨偽態度之展現？由此看來，古書豈不能疑、不當疑？

⁶⁷ 牟潤孫：〈漢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試釋〉，《注史齋叢稿》，上冊，頁246。